

L i a n y u
R e n s h e n g

炼狱人生

张强华 /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炼狱人生

张强华 著

张强华 捐赠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炼狱人生 / 张强华 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4.6
(现代作家作品选)

ISBN 7-80099-623-9

I. 炼... II. 张...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0828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

电话:(010)68218553 63202384

<http://www.e-zgsx.com>

E-mail:sanxiaz@sina.com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210 千 印数:1—1500 册

ISBN7-80099-623-9/I·85 定价:150.00 元(本册定价:24.00 元)



笔者（右）与贾植芳教授（中）合影于贾老寓所。（摄于2002年春节）
左为和笔者有完全相同经历的北大同学程绪正（副教授，已退休）

贾植芳，生于1916年10月，山西人。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顾问、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名誉会长等。几十年来，集作家、学者、翻译家、教授于一身，创作、著述和编译颇丰，出版了文学作品、学术论著、编辑与翻译之作，多达数十种。现在虽然年事已高，仍埋头治学，笔耕不辍，新作著述迭出。

与悲剧命运的抗争

——为张强华同志的《炼狱人生》而序

贾植芳

在我老迈的晚年时光里，阅读朋友的文字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习惯，从中我获得了很多安慰和启示。有很多的朋友我们从未谋面，但是通过文字，我们相知相识，结下了很深的友情。对我触动最深的是那些用生命和苦难写就的文字，它们时常让我这位从人生风雨中磕磕绊绊走过来的老人，又将目光转过身去，重新检视历史的曲曲折折，再次咀嚼人生的悲苦哀愁。近日，我阅读张强华同志的《炼狱人生》，就有这种深切的感受。

他在《后记》中这样写道：“乘着我的那一只尚算明亮的眼睛还能辨认字迹之际，赶在我的清晰记忆尚未消退之前，将历历在目的往事忠实地写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以了却获得自由后二十年来的夙愿。”这部作品深入刻画了上世纪中期中国监狱生活的真实图景与人的非文化生存状态，是一幅工笔的当代历史风俗画。作者以自己的人生遭遇与感受为主线，旁征博引历史和现实中的同类事例，考证了它们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变化。读来似幻似真，似梦非梦，作品既紧贴现实，又放眼历

史，而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却又都是“新闻”。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充满人生感慨、富有思辩性、意味隽永、引人深思的写实性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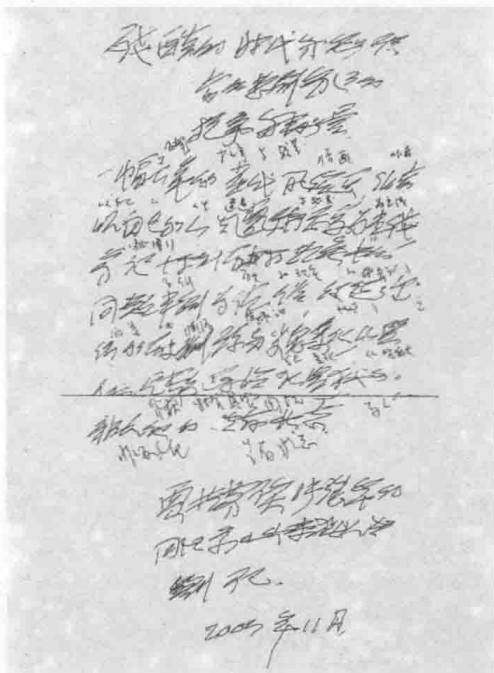
作品从监狱这一含有特殊历史文化内涵的专政工具切入，考察了政治监狱的沿革与设施及管理体制，进而究明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本质的惊人相似性——虽然在同一地点的监狱，但今人能在前人的管理体制基础上，予以升级完善，达到“自古皆然，于今尤烈”的前无古人的境界。作品通过对生活真实面貌的深入而全面的揭示，弥补了正史官书中有意回避的欠缺与不足，告诉世人及子孙正史官书中有意或无意省略的光与影。这是一部浓墨重彩记录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叶的这段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民间史诗。它通过对历史的追问和逼视，昭示读者，提醒读者上世纪中期的中国历史和社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历史经验”。它也让我们理解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真正内涵。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受难史与心灵史。作品描写了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的沉沦与苦难生活的真情实景。作者的人生故事涵盖了中国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色与面影，反映中国知识者的特有悲剧命运。它显示了时代的残酷与人心的险恶，也显示了在特殊的生活环境中人性的美丽与卑污。“改造”就是要扑灭人心中的真善美本性，发扬人性中的假丑恶，使人变成兽。作者在行文中，以自嘲自讽的口吻，叙述和交代自己的所谓“罪行”，说明了他心知肚明的清醒与生活态度，作者所采取的“小子无奈，出此下策”的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是他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被动选择，是一种自我保护，反映出作者的生活机智。在写作手法上，既有浓墨重彩的描绘，也有轻描淡写的叙述。作者笔力细致，精工描绘，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作品充分

实践与反映了文学是“表现生活真实”这一文学的根本理念。

套用一句过去流行过的口号：“亲不亲，阶级分”。我作为过来人，读到张强华同志《炼狱人生》中的泣血文字，深有旧景重温的切身感受，我的手中仿佛捏着一团火，怎么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于是就写下了这段文字，以表达我在阅读原稿后的零碎感受与感触。

是为序。

2003年11月下旬于上海



贾植芳先生《序言》手迹（起始与结尾部分）

目 录

- 序 言 贾植芳 (1)
- 第一篇 动荡不安中的成长——幼年、童年与少年
(1937 - 1953)
- 一、难民收容所中的启蒙 (1)
- 二、姑苏城内的家庭、学校与祭孔 (7)
- 三、父亲其人与其事 (13)
- 四、改名换姓的少年时代 (18)
- 五、满怀激情的中学生活 (24)
- 第二篇 旋涡中的生活——难忘的北大校园
(1953 - 1958)
- 一、老北大与新北大 (27)
- 二、校园生活拾零 (30)
- 三、怀念我的老师 (33)
- 四、记分册与毕业文凭的不同命运 (38)
- 五、在旋涡中的民主与自由 (40)
- 六、大鸣大放与《春雷》小报 (45)

- 七、袁植芬的自投罗网 (56)
- 八、同窗好友钱嘉亮之死 (59)
- 九、右派们的不同命运 (62)
- 十、一点多余的话 (64)

第三篇 束缚住手脚的自由——北京制药厂的监督劳动

(1958 - 1960)

- 一、右派先生，欢迎你们！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70)
- 二、聊以活命的生活费 (72)
- 三、无休止的批斗 (75)
- 四、“癞蛤蟆”吃不到摘帽的天鹅肉 (76)
- 五、刻骨铭心的情谊 (83)
- 六、疯狂的年代与愚昧的创举 (87)
- 七、卖画受骗记 (89)
- 八、谋虎不成，反被虎谋 (91)

第四篇 不是“犯罪嫌疑人”的犯人——草岚子看守所的预审

(1960.4—8)

- 一、昂贵的鸡蛋与廉价的手铐 (94)
- 二、看守所的生活素描与创世界纪录的狂餐 (99)
- 三、预审中的短兵相接 (108)
- 四、懒婆娘裹脚带的供词 (115)
- 五、犯人心目中的宝石与窝头冤案 (116)
- 六、最后的晚餐 (120)

第五篇 我的自新——自新路看守所中的等候判决

(1960.8 - 1962.6)

- 一、自由的拉屎、撒尿与抽烟 (123)

二、国民党少将旅长被斗记	(127)
三、比饥饿更难熬的拉屎	(130)
四、“犯人医生”胡琪桐的雪中送炭	(134)
五、风雨同舟的校友葛佩琦	(139)
六、赤裸裸去的组织第三政党未遂的鲍明黔	(148)
七、重病房诀别北大同窗、死囚袁植芬	(150)
八、一纸判决定终生	(152)
九、“衣锦荣归”故里	(163)
第六篇 划地为牢——小城川沙的流放生活 (1962 - 1965)	
一、不是名城胜似名城	(168)
二、为活着而活着的外祖母	(170)
三、扫街赎罪与租被谋生	(174)
四、响应援疆的知青广义	(180)
五、又一次当作枪靶子	(185)
六、“自由的鸟儿”又重返牢笼	(189)
第七篇 回炉改造——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风味 (1966 - 1975)	
一、话说老上海与提篮桥监狱	(195)
二、劳改犯番号4114取代了姓名	(199)
三、服刑不等于劳改，劳改才是真正的服刑	(209)
四、防空洞内的阴风凄凄	(215)
五、一群苍蝇围着牛粪嗡嗡叫	(231)
六、“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我	(233)
七、东风无力百花残	(240)
八、人、魔共处，相得益彰	(245)

九、鸟儿已经飞去，笼内未留痕迹	(253)
十、对活着出狱的一点感想	(256)
第八篇 劳其筋骨——皖南山区白茅岭农场的强制劳动 (1975 -1979)	
一、不是就业的就业	(262)
二、变相的无期徒刑	(265)
三、摔倒了爬不起来的劳动	(270)
四、汤村的知青与燕子窝的“响马”	(274)
五、这里并非全是鸡鸣狗盗之辈	(276)
六、黎明前的黑暗	(282)
七、远走高飞去北京	(287)
第九篇 无花空折枝——回到人间 (1980 年前后)	
一、重返北大，故人相逢	(291)
二、申诉中的易与难	(295)
三、西单民主墙、纪念堂与八达岭	(301)
四、无花空折枝	(305)
后 记	(312)

第一篇 动荡不安中的成长 ——幼年、童年与少年

(1937—1953)

一、难民收容所中的启蒙

一九三五年秋，我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但根据以后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定，这个普通家庭应该属于反动官僚一类。我最早的记忆只能追溯至在上海极司非尔路（即今万航渡路）的难民收容所中的生活点滴。在那里，我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记忆：那就是在一个大洋房中住着许多人家，挤挤嚷嚷，热闹非凡。那时我才三岁，是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开始不久。

洋房十分明亮、高爽，甚至相当豪华，是我一生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洋房里住的都是难民，大约有一、二百人，或许更多些，一般晚上都要打地铺睡觉。我们全家和其余几家挤在二楼一间约40平方米的大房间中，家与家之间并无多大遮隔，

可以说彼此相当暴露。正因为如此，我跑来跑去觉得十分自在。吃饭是按每个家庭人口凭卡打饭，能吃饱，味道如何，我忘了，据哥哥回忆说尚可，过得去。我的一生中有三次吃饭不要钱，这是一，其二在大学的一、二年级，三就是在监狱里了。

在难民收容所及稍后迁至康家桥的一段经历，真要感谢比我大五岁、现在福州离休的哥哥，若是没有他的帮助，我的模糊的回忆，肯定要失真得多。他离休后还在发挥余热，为他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地下室，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初次见到地下室时，我十分惊讶，怎么在几乎贴近地面的矮窗里还有幽暗的灯光，难道地下面还有房间与人？母亲告诉我，下面也住着许多与我们一样的难民，只不过都是些逃难的普通老百姓。看来，在当时的收容所中，像我家能住上房间，还有一张床，条件比在走廊、大厅及地下室睡地铺的要好得多，或许与我们是政府官员的家眷有关。

难民收容所地方很大，不仅有大洋房，还有大花园，园中有许多使我好奇的石人、石马、石碑等物。这就是前清时有名的官僚盛宣怀的祠堂，上海人称它为“盛杏荪祠堂”，也就是当时上海的第三十一难民收容所。这个祠堂，于民国初年建立，后因追及盛宣怀在清朝为官时的贪污腐败，一九二八年为国民政府没收归公。对几十年前已故贪官的这种追溯惩处，也算是件好事。前车之覆，今日的贪官不可不引以为戒！此祠堂，于一九八〇年后拆除，此处离今静安寺的“百乐门”不远。

大花园中，除了石人、石马外还有石桌、石凳，我就在石

桌、石凳上接受我的最早的教育。我的启蒙老师是同为难民的邓先生的女友（或作为妻子，新派人士，同居而不结婚）郑小姐，据说此人可能是电影导演郑小秋之妹。我的印象中，她很年轻漂亮，与邓先生都是大学生，很喜欢我，在石桌上用粉笔教我写名字。三岁的我写字还不够格，而且穿着开裆裤人坐在石凳上很觉不是滋味，常胡闹一通逃走。好在她也藉此消磨时光，故而并不生气。

我还记得大花园中，还住着很特殊的赵姓一家人，住的好像是一座小楼，而且常有日本军人出入。母亲在世时，曾说过赵家女儿很能交际，是个交际花。我们这批难民也多少受到她的一些间接的关照。昔时，秦淮八艳交际的都是达官贵人，交际花的神通广大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时母亲、哥哥和我，还有大堂兄也一齐做难民。大堂兄已是年近二十岁的青年人，因对前途悲观而自杀。他喝下了大量碘酒，惊吓得楼内许多同住人，母亲见状手足无措，吓呆了。父亲又患伤寒症住在劳工医院接收治疗，我家无主心骨，真是十分为难了母亲。幸而，同住一室的高先生，他也有病，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出外找店保，并送大堂兄去医院抢救。由于抢救及时，大堂兄平安无事，也许是碘酒这家伙杀伤力不太大之故。大堂兄至今还健在，住于苏州盘门。

我至今还搞不明白，自杀送医院抢救，为什么非要店保？可能因我家是难民，医院怕病家懒账的缘故吧！看来在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今天，某些医院的无钱不救，并不稀奇。古往今来，历来如此！

为此，以后高先生在父亲手下当过第一科科长，而邓先生也曾做过父亲的秘书。这也算是难友一场吧！

任凭我苦思冥想，也无法唤起在进难民收容所前的回忆。稍大才知道，原本父亲在上海市警察局任职。抗战前的上海市政府的辖区小得可怜，诺大的一个上海市，不是被英、美、法等国划分为若干租界，就是被日本军队所强占，国民政府管辖的恐怕只令南市一带。因此，我家住在南市宁康里。母亲说，父亲每月薪金六十元，房租为三元，化三元钱可雇一个佣人，当时上好的小牛皮鞋也只六元一双，生活很好过。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开始后，“八·一三”日寇对南市狂轰滥炸，南洋桥一带无辜百姓死伤不计其数。那时有首民歌：“矮子要想夺上海，飞机损炸弹，炸杀我老百姓，东洋人真正坏，不是好东西！”儿时的我，也跟着大人会哼这么几句。当时，父亲因公务在身，无暇顾及家庭，母亲只得带了我兄弟逃往租界避难。这就是进入难民收容所做难民的原因。

据哥哥回忆，盛杏荪祠堂已是第二、三个逃难落脚点了，之前还在卡德路（今石门路）卡德大戏院附近的一个尼姑庵改成的难民收容所住过。在那里，随同做难民的我二舅，曾被一小尼姑相中，定要跟随我二舅而决心还俗。没过多久，二舅去了重庆，罗曼史也告结束。这一切，我全无印象，只能借他人回忆，作一补充。

据父亲说，当时警察局改变成别动队，父亲是什么校级参谋，准备与入侵的日军对抗作战。日寇进犯后，虽然有谢晋元团长坚守“四行仓库”与日军血战到底、宁死不屈的英勇奋战，终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失败。警察改编成的别动队又能有多大作用！其结果，当然是溃不成军，父亲与一同事共乘一辆三卡（即带船的摩托车）退至租界，无路可遁，只得向租界当局缴械，才免被日军俘虏的厄运。

难民收容所最后也不能使难民幸免于难，不久盛杏荪祠堂

被日军占用，难民收容所不得不解散。我们遂搬迁至金神父路（今瑞金路）向一中年妇女租用一间约十五平方米的客堂（与该妇女合住）栖身。约半年后，因父亲病愈出院，又迁至今万航渡路的康家桥。我清楚记得，一辆四个小轮的大铁板车，放上逃难时带出来的全部家当，车夫使劲在前面拉，一家人跟着在后面走，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搬进了上海有名的下只角康家桥的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

康家桥是靠近现今普陀区的一块颇大的上海老区，内中有高低不平的三角石铺的许多小街，有不少平房、矮楼、甚至木板房，也有一些老式石库门楼房，那就算是上乘的了。各小街上有不少杂货店、点心店等等，可算得上是一个集镇。一下雨满街泥泞不堪，大雨时甚至水过膝盖。我曾在康家桥的茸光小学就读幼儿园，那时正穿着开裆裤呢！发大水时，母亲背着我涉水返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今的康家桥在改革开放声中已出现了高楼大厦。只是部分简屋陋房犹在，类似于生物界的活化石，估计不久也会消失。

我家先住在石库门房子二楼的亭子间。二楼厢房是一个加工猪鬃的作坊，整天臭气冲天，令人作呕。幸而不久，该作坊搬走，我家搬进了此厢房。楼下是一家谈姓老板开的小纸盒厂，装胭脂花粉的小纸盒十分精致，对我颇有吸引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厂的一个学徒，因被怀疑偷了老板的钱，被吊起来拷打，小青年的哇哇惨叫，令人毛发悚然！那时，对此类暴行无人过问，更无法律制止。不象现今，老板怀疑工人偷窃，不用说拷打，即使对工人实行搜身，马上有新闻记者过问，工人还可以上告法院。落后了几十年的我国法制，终于向世界先进的法治看齐，今天人权的保障与半个世纪前相比，真乃天壤之别！老板娘因老板有外遇，多次自杀未遂，闹得不可

开交。但工人们对此却不亦乐乎！

父亲的皮包内一直放着一本过期的着西服照片的护照，那是申请去越南河内、转道至重庆的护照。当时，去重庆的路已被全部封锁，上海去重庆不得不绕道河内。难怪我曾从书上看到汪精卫逃离重庆也是绕道河内才进入沦陷区的。父亲之最终没有去成重庆，是因为遭到了那场完全意想不到的严重伤寒症。在当时科学不发达的时代，没有青霉素、链霉素，就是磺胺类药物也只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才问世，更兼当时的兵荒马乱，这真是九死一生的疾病。父亲在医院里治疗了几个月才逃脱了死神的召唤，却也耗去了家中大部分积蓄。大病初愈的父亲，人已十分虚弱，去河内的交通也越来越不通畅，请求当时的救济会会长虞洽卿支持路费也无回音，眼看护照过期，无奈失去了奔赴当时的抗战大后方——重庆的机会。如果，当时父亲去了重庆，则他乃至我全家将又是另一种命运！所以，后来父亲投入汪伪政府是由于生活所迫，或是骨子里就缺乏民族气节，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更或是其它政治上的原因促使，作为幼童的我，当然无法知道。父亲生前极少谈及他的过去，联系本书中将叙述有关他的一些事件，内中底细着实使人迷惘不解。最终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父亲，只有他自己向上帝去诉说了。世事纷乱，错综复杂，内中底细实无绞尽脑汁的必要。

无论汪精卫他们用所谓的“还都南京”，还是依然挂着只是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顶端上多了一面三角形的、上书有“和平、反共、救国”的小黄旗（后来这面小黄旗也消失了）的中华民国国旗，都无法掩盖这个政府丧失民族气节的本质。一失足成千古罪人，无论用什么“曲线救国”的高调，还是借用“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救人”的佛经，都无法把他们从耻辱柱上解脱下来。